

Arany János

阿兰尼诗选

(匈)阿兰尼



ARANY



Arany János

阿兰尼诗选

〔匈牙利〕约瑟夫·拉约什·阿兰尼著

王维平译注

Arany János összes Művei
ARANY VALOGATOTT KÖLTEMÉNYEI

本书根据 Akadémiai Kiadó, Budapest, 1951年版译出

阿兰尼诗选

〔匈〕阿兰尼·雅诺什著

兴万生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丹徒人民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5 插页 3 字数 220,000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5327-1594-9 / 1·952

定价：14.70 元

译 本 序

“你问我是什么人？我是人民的儿子！”^①
——阿兰尼·雅诺什

阿兰尼·雅诺什(1817—1882)是和民族骄子裴多菲同时代的匈牙利另一位著名诗人。裴多菲以擅长抒情诗^②蜚声于世界诗坛；阿兰尼则用扎根于匈牙利乡土的叙事诗作出卓越的贡献。^③他们恰如两颗巨星，辉耀于19世纪中期奥匈帝国时期的匈牙利的夜空中。

阿兰尼1817年3月2日出生在匈牙利东部纳吉-索伦塔村的一个所谓“纳税的农奴”的贫苦家庭里。父亲阿兰尼·久尔吉

① 引自阿兰尼的《给裴多菲的覆信》，全诗见本书第一首。此处引文系本篇第四节的首句。

② 鲁迅在《“勇敢的约翰”校后记》中论述裴多菲时说：“他的擅长之处，自然是在抒情的诗。”欧洲一些文艺批评家称裴多菲是“马扎尔的抒情诗王”。

③ 见卢卡契·久尔吉1946年作《多尔第一百周年纪念》。

和母亲麦捷莉·沙萝也都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他们住的是用粘土砌成的土屋，靠十霍尔特^① 土地勉强维持生活。阿兰尼幼年时期衣食不周，十四岁开始在田间干着一个成年人的活。他先在本村的学校读书，后来进了匈牙利第二大城市德布勒森的大学。由于家贫，他的学习一度中断，在吉什-屋伊萨拉什村当教员。一年以后，他回到德布勒森，参加了一个巡回剧团，做了两个月演员。后来他失望地返回故乡索伦塔，担任那个地方的副公证人，即第二公证人。

1848年3月15日，在布达佩斯爆发了由裴多菲领导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市民起义。阿兰尼接到了裴多菲的《民族之歌》的传单，马上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示愿意站在民族革命的近卫军的行列中。阿兰尼受到革命浪潮的冲击，毅然投身于起义群众的斗争中。四月间，他应裴多菲的邀请，来到佩斯筹办《人民之友》报，六月起担任该报编辑，并写了很多政论，阐明革命斗争的重大意义，要人民群众起来保卫祖国，保卫自由斗争的果实。在担任编辑的几个月当中，除了撰写政论，他还创作了二十多首诗，鼓舞人们投入自由斗争，并且斥责动摇分子。

匈牙利争取独立的革命战争失败之后，唯一最亲密的朋友裴多菲在瑟什堡战役中阵亡，他不得不隐匿于索伦塔的郊外，躲避反动势力的迫害。直到1851年他才当上纳吉-克洛什村的中学教员。革命失败，好友阵亡，这一切在阿兰尼的心头上笼罩一层阴影，消沉与绝望充塞他的心灵，很长时间不能消去。直到19世纪60年代，阿兰尼的生活才开始有了变化。在意大利

① 霍尔特(Hold)，匈牙利土地面积单位，一霍尔特合0.57公顷。

革命的影响下，哈布斯堡王朝的专制制度逐渐削弱。为了缓和矛盾，奥地利政府表示愿意给予匈牙利以名义上的独立。匈牙利的贵族阶级同奥地利政府签订了协定。这一时期，阿兰尼似乎看见了祖国前途的一线光明，但又不敢确信未来，前途仍是一片朦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生活的微弱变化，阿兰尼的苦闷、消沉、退隐的思想似乎有所减轻，但又不能消除净尽。

1858年阿兰尼四十一岁时，被选为匈牙利科学院通讯院和正式院士。这一时期，他从纳吉-克洛什来到佩斯，任吉什-法鲁蒂协会^①主席，并主持日常工作。1865年他被选为匈牙利科学院的学术秘书。从此他致力于史学和文学史的研究工作。

阿兰尼憎恶1867年以后的妥协政治，却又不敢著文痛斥当前政事，只得怀着隐痛，从事阿里斯多芬和莎士比亚戏剧以及果戈理作品的翻译工作。这时他已经很少有做裴多菲朋友时期那种激情与意志了。1882年10月上旬，裴多菲的高大的青铜像在多瑙河左岸的三月十五日广场上举行落成典礼，阿兰尼由于患病未能出席并主持铜像的落成仪式。他患重感冒，后来并发肺炎，终于一病不起，于同年10月22日溘然长逝。

二

阿兰尼很早就开始写诗。他说道：“我记得，在受到广大的世界注意之前，在纳吉-索伦塔的小小的天地里，我被认为是某一种诗人的。”^②他的诗没有受到“革新派”^③——即语言改革

① 吉什-法鲁蒂协会，为纪念吉什-法鲁蒂·卡洛伊，于1838年建立起来的作家团体。

② 《多尔第》再版后记，见《阿兰尼全集》，第5卷第102页。

③ “革新派”，即由吉什-法鲁蒂·卡洛伊等作家所发起的文学运动，单纯要求语言美和文学体裁的多样化。

者们所宣扬的文学主题与文学语言的影响。他的创作灵感和语言来自劳动人民，来自民谣和农民诗，甚至来自流传于乡间的唱本。这种影响十分明显地反映在他的几部英雄史诗和歌谣集中。深厚的民族性和时代精神，构成了阿兰尼诗歌的最突出的特点。

到了19世纪30年代，匈牙利有了一次政治上的复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科苏特展开了活动，创办《佩斯新闻》，在议会中发动了一系列的改革。在比较进步的下议院与反动的上议院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一斗争不仅在议院和首都展开，而且已经蔓延到全国各地。到了1845年，不安和骚动达到了顶点，敌对的两个党派在选举和议会中正式交锋，开始论战了。阿兰尼没有参加实际的斗争，但他对看到和听到的种种事情作了研究，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写成了幽默的讽刺长诗《失掉的宪法》。在这部长诗中，阿兰尼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对那些争权夺利的奸商化的议员们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并且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人和普通人”的身上，就是从人民的儿子们那里等待振兴国家的希望。这部长诗获得当时文学团体吉什-法鲁蒂学会的奖金。阿兰尼从此活跃于匈牙利诗坛，赢得了叙事诗人的光荣称号。

1846年2月间，吉什-法鲁蒂学会举行了新的叙事诗的竞赛，2月8日公布的征求要求如下：“……作品的主人公必须是活在人民口头传说中的历史人物，例如玛加什国王^①、多尔第·米克洛什、卡达尔^②武士等等。作品的形式和风格必须通

① 玛加什（1440—1490），匈牙利国王，匈牙利王室中央集权的统治的建立者。

② 卡达尔，即卡达尔·伊斯特万，17世纪历史上的一个传说中的英雄人物。

俗。”^① 阿兰尼参加这次竞赛的作品就是《多尔第》。据史料记载，一种说法是：多尔第一家生活在14世纪拉约什国王统治时期，多尔第·米克洛什是历史上的、同时又是人民传说中的英雄。另一种说法是：多尔第一家是索伦塔村的大地主，村头未竣工的古堡就是多尔第家族的遗址。阿兰尼将两种说法融合，更多地采用了民间传说，这就使多尔第的形象更能有血有肉地活在人民中间。阿兰尼认为，虽然是文艺创造，但必须原原本本地沿着史料的足迹去探索和追寻。在阿兰尼以前，匈牙利古典作家就曾经写过关于多尔第·米克洛什的传说故事。第一个是16世纪的行吟诗人伊洛斯沃依·彼得^②，后来吉什-法鲁蒂·卡洛伊^③和魏勒斯马尔蒂·米哈依^④各写过一首短诗。阿兰尼创造多尔第的英雄形象，是以伊洛斯沃依的韵文《史传》为基础，并加以发展而写成的。每首歌开头的引文，就是来自那部《史传》中的诗句。但是阿兰尼采用了更多的夸张手法，并没有受到《史传》的限制或束缚。通过对主人公形象的刻画与对长诗内容的深刻阐述，这部长诗的民主倾向和人民倾向更加完整地反映了出来。阿兰尼作品的人民性、人道主义，在刻画主人公的形象中，在真、善、美的范畴内得到了充分的阐明；而且这部长诗正是诗人创作思想的全面反映。长诗的人民性与匈牙利古典文学中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也得到了巧妙的融合。阿兰尼笔下的多尔第是一个纯朴、善良、机智和勇敢的青年，而且

① 参见《匈牙利文学史》第四卷，第102页，匈牙利科学院出版社，布达佩斯，1965年。

② 伊洛斯沃依·彼得（1530—1574），匈牙利诗人兼作家，曾经写过关于多尔第·米克洛什的长篇故事诗。

③ 吉什-法鲁蒂·卡洛伊（1788—1830），19世纪匈牙利诗人兼作家。

④ 魏勒斯马尔蒂·米哈依（1800—1855），匈牙利浪漫主义诗人，裴多菲走上文坛，全靠他的资助。

这样的人物正是阿兰尼诗歌中一切英雄的典型。多尔第不是农奴，他自己决不承认，别人称他是农奴的时候，他极为伤心，似乎觉得失掉了尊严。他同劳动人民隔了一道“天然屏障”，那就是他出生在贵族家庭而又长期生活在纨绔子弟们当中。他虽然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但又不愿意抛弃贵族门第的荣耀。在第四歌第十六节中他表达了自己幻想成为一个武士的愿望，他觉得自己是：

不会跟扛镰刀的雇工们同命运，
在田野里从事辛苦的体力劳动。

在最后一歌第十八节中米克洛什又说：

如今我要和久尔吉交换住地，
他去乡下耕田，我住在宫廷里。

多尔第和胞兄久尔吉的矛盾，实质上是代表了两个阶级、两种立场的对立。为了争夺祖上的财产，久尔吉施展了各种伎俩，妄图谋害胞弟。这种杀亲谋财的例子，在封建社会里是屡见不鲜的。多尔第虽然出生于显贵家庭，由于他常常和农奴接近，干起活来“像牛一般”^①，他了解他们的疾苦，在某些地方和他们有着共同的思想感情，同受苦人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这就使多尔第的思想意识高出一层，具有了进步意义。

《多尔第》的创作成功不仅给阿兰尼带来了声望，而且更重

① 见《多尔第》第二歌第十一节。

要的是还给他带来了裴多菲的友谊。裴多菲在给盖雷尼·符利捷什的信中写道：“你要知道，为什么我急忙来到索伦塔呢？为什么我又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呢？因为在索伦塔住着一个伟大的人物。他是我的朋友！《多尔第》的作者阿兰尼·雅诺什。如果你还没有读过这部作品，我同你讲也是白费；如果你读过了，我再解释，就成了多余的废话了。这首诗是一位很平常的乡村公证人写的。……缪斯女神并不是保守的女人。一百年以前，它们飞出天堂，翅膀连接着翅膀来到人间，并且高呼‘人民万岁！’缪斯女神飞下壮丽的赫利孔^①高山，飞进简陋的茅舍，并且在那里定居下来。我是多么幸福，因为我就是诞生在茅舍的草堆里的啊！”^②

从上面这段文字中，不仅可以看到两位诗人“亲密如一母所生的手足兄弟”^③的关系，更可看到裴多菲对《多尔第》的推崇与赞扬。裴多菲在9月9日写给阿兰尼的信中说：“到目前为止，《多尔第》这部长诗，我已经读了六遍。这真是一部金光闪烁的巨著啊！今年我至少还得读它六遍”。^④裴多菲发现阿兰尼是一位伟大的人民艺术家，而且是劳动人民自己的诗人。从长诗的主题思想和语言艺术来说，除了裴多菲的《雅诺什勇士》之外，《多尔第》是19世纪中期匈牙利诗坛上从“诗歌革命”到“革命诗歌”的又一巨大的成就。

裴多菲是第一个读到《多尔第》手稿的人，读后赞叹不已，

① 赫利孔，古希腊比俄细亚境内之名山，位于雅典北部。希腊神话中，传说缪斯九女神居于此山上。

② 引自裴多菲《旅行书简》第七封信，汉译见《裴多菲小说散文选》，第24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③ 引自裴多菲《旅行书简》第七封信，汉译见《裴多菲小说散文选》，第248页。

④ 见《裴多菲小说散文选》，第400页。

并在1847年2月4日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①和《致阿兰尼·雅诺什》^②一诗，认为这部长诗“像草原上的铃铛一样朴素，而且也一样的清新。”^③从这个时候起，两位诗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一直延续到裴多菲战死于瑟什堡战役。他们最初来往的书信和赠诗，不仅是研究19世纪中期匈牙利诗坛上关于创作人民诗歌的讨论的重要资料，而且也是诗歌创作面向劳苦大众的良好开端。裴多菲在信中说：“不管人们怎样讲，可是真正的诗歌是人民的诗歌。”^④又说：“一旦人民在诗歌领域中成为统治者，那就意味着他们在政治上成为统治者的日子已经不远了。”^⑤裴多菲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先进主张，得到了阿兰尼的赞同。两位诗人对于诗歌创作的理论和实践，使他们成为19世纪匈牙利文坛上最先进的开拓者。阿兰尼认为，诗歌创作应该有高度的民族特色，他说：“假如人民的诗歌提前繁荣起来，那么我就有希望创造出自己民族的诗歌来了。”^⑥他们的政治信仰相同，所遵循的文学创作原则一致，两位诗人互相起着有益的影响。阿兰尼在1847年2月28日致裴多菲的信中说：“关于史诗，我想讲上几句。恰克·马岱^⑦和拉科治^⑧——甚至多热^⑨——

① 见《裴多菲小说散文选》，第383页。

② 见《裴多菲抒情诗选》，第26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 见《裴多菲抒情诗选》，第263页。

④ 见《裴多菲小说散文选》，第383页。

⑤ 见《裴多菲小说散文选》，第383页。

⑥ 见1847年2月阿兰尼给裴多菲的第一封信，见本书《附录》〔一〕第287页。

⑦ 特兰钦的恰克·马岱，匈牙利13世纪反对罗伯尔·卡洛依国王的民族英雄。

⑧ 拉科治·费伦茨(1676—1735)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领导匈牙利人民反抗奥地利统治的民族独立斗争的领袖。

⑨ 多热·久尔吉，1514年匈牙利农民起义领袖。

经常在我的头脑中盘旋。”^① 他又说：“按照自然的永恒的法则，多热的行动不是别的，它是一个小小的 Reakeio”^②。他认为这是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斗争，是圣多明各不信神的奴隶们的暴动^③。诗人歌颂他们，因为他们为民族解放事业流尽鲜血，敢于同黑暗势力作战，为民族独立建立了功勋。

阿兰尼在1847年2月最初给裴多菲的信中这样问道：“假如有这样的诗人，他用人民的精神和人民的语言写下庄重的史诗，那时你将对它发表怎样的意见呢？”^④ 裴多菲在同年2月22日的复信中，精辟地阐明了关于创作人民诗歌的理论，他说：“你在信里问我用人民的精神和人民的语言来创作庄重的史诗，是不是一种幻想？我想，不是的。假如你尽快地拿起笔来，你会写得很好的；但是不要挑选国王当英雄，甚至连玛加什也不要挑选。他也是一个国王。要晓得，无论是黑狗还是白狗，总而言之，一句话，都是狗。”^⑤ 裴多菲的鲜明的憎恶封建统治的立场和创作指导思想，在这段文字中表现得十分透彻，而且得到了阿兰尼的赞同。他在覆信中同样阐明了自己的创作主张：“……我必须把人民描写成自由者、高尚的人物和紧握武器的人……”^⑥ 他崇敬那些在历史上建立功勋的英雄们，称赞他们是血管里流着“粗暴的、顽固的、烈性的血”^⑦、而且又是流

①② 引自阿兰尼1847年2月28日致裴多菲的信，见本书《附录》〔一〕第290页。
Reakeio，拉丁文，“反动”之意。

③ 圣多明各是西印度群岛中的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首都。此处指1844年，杜亚尔特领导多米尼加人民起义，赶走海地统治者，从而获得独立的斗争。

④ 1847年2月阿兰尼致裴多菲的第一封信，见本书《附录》〔一〕第287页。

⑤ 见1847年2月23日裴多菲致阿兰尼的信。汉译见《裴多菲小说散文选》，第386页。

⑥ 见1847年2月28日阿兰尼致裴多菲的信。

⑦ 1847年2月28日阿兰尼致裴多菲的信。

着“勇敢的、诚挚的、纯洁的血”^① 的人物。在这种创作思想指导下，再加上经受革命战争的洗礼以及裴多菲对他的帮助和鼓励，阿兰尼在政治上更加成熟起来，在诗歌创作方面写出了比以前更加坚定的革命诗篇。阿兰尼和裴多菲总结了匈牙利文学史上三百年以来伟大作家的经验，分析了前辈们在创作方法上的特点和利弊，创造性地提出了他们的先进的文学主张。他们对美学中的几个基本问题——例如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文艺的特征与社会作用，以及形式和内容的关系等问题，都作了认真的讨论，并且在诗歌创作中运用自己的理论，获得了很大的成就。阿兰尼的成就，除了《多尔第》之外，还有《多尔第的晚年》和《多尔第的爱情》，这洋洋万言的长篇三部曲叙事诗，在匈牙利文学史上产生了空前的影响。

匈牙利著名文艺理论家卢卡契·久尔吉于1946年所著《〈多尔第〉一百周年纪念》一文中指出，19世纪40年代匈牙利出现裴多菲的《雅诺什勇士》(一译《勇敢的约翰》)和阿兰尼的《多尔第》两部长诗，在整个欧洲文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卢卡契说：“这两部长诗有它们的民族特色。它们的特色就是1848年匈牙利的社会基础和力量……。”多尔第·米克洛什和雅诺什勇士所以产生巨大的教育作用，就在于他们是植根于一个落后的农奴制国家民族觉醒、而资本主义尚不发达的土壤之中。阿兰尼创作《多尔第》的功绩在于他预示了即将兴起的欧洲革命运动必将影响匈牙利社会的各个阶层。长诗的主人公显示了人民的力量、意志、愿望和崇高的道德观念，展现了人民群众的内在的精神潜力。这说明阿兰尼具有一定的政治远见与对未来社会的洞察

① 1847年2月28日阿兰尼致裴多菲的信。

能力。他所创造的英雄人物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适合人民群众的要求，在1848年革命爆发时，更显得多尔第这样的英雄人物的巨大的教育和鼓舞作用。就长诗的艺术价值来讲，它包含了阿兰尼的诗歌的一切艺术特色。作者以严谨的结构，在运用语言的能力和对人物以及农村景色的描写等方面，都超过了他前辈的诗人。对人民的热爱和对压迫者的憎恨，在每节诗中都闪烁着光辉。

《多尔第》的写作时间要比《雅诺什勇士》的完稿时间晚两年，更接近1848年革命。这两部长诗皆取材于民间传说，但是裴多菲在长诗中塑造的英雄人物是一个贫苦的牧羊人的成长过程，即最底层的劳苦人民成长过程。然而阿兰尼笔下的多尔第·米克洛什都是旧日大家族中的一个叛逆者。从两位诗人对主人公塑造的角度来看，《多尔第》却不像《雅诺什勇士》那样，对劳动人民有更多的积极的社会意义。从本质上看，裴多菲的长诗的主题思想要高于阿兰尼的长诗，这就表现了裴多菲自始至终地歌颂下层劳苦人民，沿着平民文学道路的革命方向前进。

阿兰尼的另一部重要长诗《多尔第的晚年》(1847—1848)，是《多尔第》的续篇(亦称《多尔第》三部曲的第三部)阿兰尼着手写作《多尔第的晚年》时，裴多菲正在领导起义队伍同封建势力英勇鏖战；但是裴多菲十分关心这部长诗的写作，曾屡次写信催促阿兰尼尽快脱稿，并替他介绍出版。由于战况紧张，阿兰尼尚有更紧急的革命任务，以致裴多菲于1849年阵亡前未能读到这部长诗的手稿。这是十分可惜的事，《多尔第的晚年》直到1854年才初次印行。

《多尔第的晚年》仍取材于伊洛斯沃依的韵文《史传》。诗人

创作这部长诗的意图，在于阐明社会应该向前发展，人类应该进步；但是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和民族的传统，二者并驾齐驱，同心协力，去冲破旧势力而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阿兰尼着重刻画多尔第同宫廷的矛盾，描写多尔第对于拉约什国王的愚昧、落后、保守行为，以及淫荡生活的憎恶：

他讨厌宫廷生活和残酷暴政、
意大利的装饰、时髦的歪风。
富丽堂皇的宫殿他看不上眼，
发出许多怨言：“我解甲归田！”

多尔第愿在辞去官职之后，返回故乡索伦塔，等待悲惨的一死。但是，多尔第又有他阶级的局限性，对骑士生活尚有眷恋之心。他犹豫，彷徨，最后终于招来了国王对他的谋害。他虽有觉悟，但事态发展必然导致悲剧的结局。全诗的气氛是阴沉、悲壮和感伤的，但也夹带着愤慨与激昂。作者企图从各方面来刻画多尔第的暮年，在最初的场面中，多尔第和仆人班采挖掘墓穴，严寒而又寂静的冬天不仅统治着旷野，而且也统治着多尔第的精神世界，随处可见多尔第对人生发出的感慨。可是随着使者的到来，却唤起了多尔第对民族复兴的光荣情感，唤起了他的青春活力与振兴民族的急切要求和愿望；甚至倒在病榻上，他依然思念祖国未来的前途。诗人在第五歌第十二节中写道：

他们不止一个人访问过维也纳城，
拉约什在那里点燃科学的明灯，

不止一人参观过巴黎和波伦亚，
国王慷慨解囊，以新金额打发，
从科学的树上采摘丰富的果实，
好的加以吸收，坏的加以扬弃。

拉约什国王在匈牙利历史上有他进步的一面，懂得“科学救国”的道理，向西方国家学习。1367年他决定建设维也纳，创办了许多大学；并模仿西方（主要是意大利）的形式，派遣大批学生出国留学。这是拉约什在管理国家时留给匈牙利人民的精神财富。

三

为争取人民民主的权利和民族独立而爆发的革命战争，极大地鼓舞着阿兰尼。“出版自由啦！”^①——他可以不受书报审查制度的束缚而自由地写作了。他的抒情诗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848年4月的一天，一支民族近卫军经过纳吉-索伦塔，阿兰尼认为这是一支真正的匈牙利民族的军队。就在这天晚上，他写下了充满激情的《民族近卫军之歌》，颂扬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战士们。这一时期，从奥地利统治下逃脱出来的士兵，大批地参加了科苏特的护国军。经过训练和教育，终于成了一支满怀爱国热情的军队。当科苏特宣布匈牙利独立而永远脱离奥地利统治的时候，阿兰尼写下了著名的诗篇《四月十四日》，表达了对革命的坚定的信念，以及他的彻底的革命精神：

① 这是裴多菲1848年3月15日的《日记》的首句。

独立！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自由！这就是伟大的目的：
完整的独立，完整的自由；——
只要这两样，不需要别的。

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阿兰尼和裴多菲一样，不仅是诗人，而且更重要的是民族解放的战士。1849年自由斗争失败以后，阿兰尼诗歌的音调发生了变化。痛苦代替了欢乐，失望代替了信心。在奥匈帝国统治的黑暗时期，革命的失败给他的心灵留下了沉重的负担，怀念亡友裴多菲的感情越来越重了。裴多菲的妻子森德莱·尤丽亚于1850年7月21日脱掉黑纱另嫁他人，阿兰尼写下《护国军的寡妇》一诗，表示对亡友的轸悼与对孤儿寡妇的哀怜。诗人采用了小叙事诗的形式，在人物对话中更深一层地描绘了一个护国军的游魂同活着的妻子和儿子的哀怨。一个家庭的悲剧，象征一个民族的悲剧。他在写给森德莱·尤丽亚的《题纪念册》一诗中回忆裴多菲时，表达了作者对祖国和亡友的一片忠诚：

我听不到他的名字，人们
似乎把他忘记了，不再提起；
可是他被埋葬在民族的心中，
我感觉着……只是暗中叹息……

他的著名的诗篇《行吟诗人》，描写诗人退隐森林，成了流浪者的痛苦的遭遇。在《我放下了七弦琴》一诗中，作者回忆他同裴多菲共同战斗的幸福时光，但是革命的失败却招来了民族